

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冲突与融合：评露西娅·波尔德里尼的《他人的自传：历史主体与严肃小说》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Factuality and Literary Fictionality: A Review of *Autobiographies of Others: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Fiction* by Lucia Boldrini

袁雪生 (Yuan Xuesheng)

摘要：露西娅·波尔德里尼教授在《他人的自传：历史主体与严肃小说》中将传统的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诗歌视为传记作品——他传，在更广阔背景下论述了以历史主体为传主的其他传中的乌托邦建构、他传中的暴力与法律、他传中的文献与身体的美学、他传与责任感、以及他传中的对话与历史等内容，涉及到传记/自传写作中的历史性与文学性、真实性与虚构性、伦理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等诸多问题。作者选择了戴维·马洛夫的《一种想象的生活》等六个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传记/自传历史主体的人生历程，分析了传主身份建构中的双重自我的话语叙述，阐述了一种内在的伦理关系。该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拓展了传记/自传研究的边界和视野。

关键词：露西娅·波尔德里尼；他传；边界；双重自我；伦理

作者简介：袁雪生，文学博士，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族裔文学、美国传记文学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Title: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Factuality and Literary Fictionality: A Review of *Autobiographies of Others: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Fiction* by Lucia Boldrini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monography *Autobiographies of Others: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Fiction*, in which Lucia Boldrini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topia of m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and the law, the document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body, the nar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ialogue and history in hetero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characters, involving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ty and literariness, truth and fictiveness,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law and politics. The book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auto/biographer's life

experiences, “double I” narration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a kind of inherent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literary works such as *An Imaginary Life* with a special critical perspective and refreshing ideas, which broadened the generic boundaries of auto/biography studies.

Key words: Lucia Boldrini; Heterobiography; boundary; double I; ethics

Author: Yuan Xuesheng,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American Auto/biograph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xshyuan@163.com).

传记是一种古老的文类，诞生于《圣经·旧约》，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无论传记写作还是研究都相对落后。里昂·艾德尔曾经感叹传记理论的匮乏，“我很遗憾地认为，没有任何传记批评值得一提，批评家早已学会如何评价诗歌、小说和戏剧，但对传记却无能为力”(Edel 32)。鉴于此，他提倡建立传记诗学，并发表了大量有关传记研究的论文。如果说西方现代传记理论萌芽于约翰生，创建于伍尔芙、莫洛亚，那么到了艾德尔就开始走向成熟并全面发展。传记/自传研究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论著成倍增加。有学者甚至说，“如今自传所占据的地位就是昔日新批评盛期诗歌所占据的地位”(Folkenflik 11)。伦敦大学英语系教授露西娅·波尔德里尼的《他人的自传：历史主体与严肃小说》（以下简称《他人的自传》），是一本研究传记/自传的学术专著，她选择了戴维·马洛夫的《一种想象的生活》、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的真实历史》、翁达杰的《比利小子》、吉尔伯特·阿戴尔的《作家之死》、安娜·班蒂的《阿特米西亚》、曼努埃尔·蒙塔尔班的《佛朗哥的自传》等六部作品，详细论述了以历史主体为传主的他传中的乌托邦建构、他传中的暴力与法律、他传中的文献与身体的美学、他传与责任感、以及他传中的对话与历史等内容，涉及到传记/自传写作中的历史性与文学性、真实性与虚构性、伦理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等诸多问题。该书将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小说、诗歌视为传记作品——他传，在更广阔背景下研究传记主体的人生历程，并论述了传主身份建构中的不同的话语叙述，阐述了一种内在的伦理关系。该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

露西娅在《他人的自传》中开篇指出，传记/自传本质上是个体声音的画像。她引用了戴维·马洛夫在《一种想象的生活》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对奥维德的一生知之甚少，正是这种事实的缺乏使他成为了我叙事的中心人物，并且让我拥有了创造的自由，因为我想要写的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文学传记，而是基于各种可能事件的小说”(Boldrini 1)。马洛夫的小说究

竟是怎样的呢？它既不宣称有着传记的准确事实，也不是基于历史真实可靠性的历史小说。但是，它依然可以说基于事实的逼真，尽管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很大可能的，如同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这种在历史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显著特征，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出版的大量小说，这些小说仿佛就是历史人物的自传——它们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事实和虚构的关系，由此也带来了传记最根本的结构、叙事和伦理问题，这正是传记/自传研究的核心所在。

露西娅首先探讨了他传作为文类的普遍性的边界问题，界定了他传的定义。读者明白这些文本不是自传：他们并没有推销他们自身，封面上的作者名字并不是叙事者和人物的名字，因此读者无法期待作者受到自传契约的约束，就像勒热讷所说的自传作者、叙事者和主人公的一致，这样的契约牵涉到所有的叙事和伦理问题，比如叙事者或作者必须跟读者讲真话。“在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文本内在的事实都是基于读者对人物历史性的认可，就如同他们使读者认识到自传和传记的基本分界——第一人称书写和他人书写、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区别”(Boldrini 2)。露西娅随后进一步讨论了写作中的主体的地位问题：在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自传中，语法层面的第一人称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介于历史的、虚构的和作者的主体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揭露，自传作者和讲述历史人物事件的“双重自我”、叙事者和历史人物的“双重自我”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系。如何才能以他人的名义为另一个人说话？这种身份的欺骗明显带来不安和紧张，但也令读者向往。这也涉及到自传和死亡书写的关系。马洛夫写了奥维德的“离开”时刻，翁达杰的比利小子一开始就死了。佛朗哥的自传能够以他人口吻书写，因为命令者已经死了。他传存在着一种源于死亡的权威，濒临死亡的人的话语对活着的人而言，有一种力量来自他们最终的结局，来自他们接近时光终点而无以为继的那一刻。遗嘱作为一种超越死亡的声音，将活着的人与他们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他传也存在着一种源于历史、过去以及不再改变的往昔的权威。这些作品探索和揭示的正是这种权威，它们揭示了传记和自传在结构上的普遍区别，前者是一个健在的人书写另一个人，后者是由健在的我书写过去。从根本上说，自传总是不完整的，因为只有“我死了”这种自传性表述才能说明自传的完整，但这是不可能说出来的。露西娅探讨的这些文本，很多都将主体置于死亡的边缘，这样能让死去的人物说出“我死了”的话语，只能通过别人作为代理人，由此实现自传无法达到的完整性，却是自传主体所希望的。露西娅所使用的“他传”，非常恰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传记文类边界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模糊界线上。通常被认为是历史的/传记的小说加以研究，用琳达·哈琴的话说，“历史传记元小说”，米德克和胡贝尔称之为“传记小说”(Biofiction)，劳拉·萨武称之为“作者小说”，雅各布斯称之为“新小说

传记”，露西娅曾经使用“自传性小说”来命名，但不久用回了“他传”，“他传”能够更好地描述作家的主体意识如何渗入人物之中，以及在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个体生命和自传文本之间保留一种本体论的、批评的、符号学的界限。“他传”理应描写传记本身，描写另一个人的生命书写，用“他传”来命名这些文本或者这类重要的文学现象，这是因为其自发的共鸣以及与自传的比较，强调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可以说，他传是在符合事实的假象下以他人名义说话，可以看做是一个人的身份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恍如一种清醒的疯狂，一种超越或离开理性车辙之外的任务，这便是这些作品的中心，也有益于对历史主体的哲学本质的探寻。

二

露西娅随后追溯了传记/自传的历史主体研究的批评语境。评论家娜奥米·雅各布斯回顾了早期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法兰森更进一部，追溯了古典时期的作品。舞台成为了一种展示历史人物的恰当方式，它戏剧化地展现主体面对冲突的需求时的道德和思想的两难处境。以罗伯特·布朗宁的戏剧独白为例，这种很接近他传的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在诗歌里听到了一种声音，看到了一个说话的主体跟听众演讲，读者在说话者自己的话语中注意到了听众的反应。许多诗歌人物都被赋予一种历史和现代的声音，既从心理层面也从语言维度探索了自我表现。罗伯特·伦博姆论述了存在于同情和道德判断之间的一种冲突，目睹了人物日常话语中的明显的可怕力量。他传中的双重自我的隔阂，内在于文学重构中的人物的历史性中。罗伯特·格雷夫注意到了一种可能的分界线，存在于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历史小说中，它对叙事复杂性、虚构和历史的“我”、以及形式本身的暗指漠不关心，却非常关注历史的个体及其存在方式，由她所生活的社会处境所授予或拒绝的自主权利，以及主体通过写作创造或探索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在传记/自传形式的暗示中赋予了一种对自我叙事的特别关注。

露西娅指出，这些作品中历史主体的自我叙事，跟早期的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人称叙事存在着区别。在假装以另一个人的声音来叙事的过程中，作品中的自我认可、甚至自我意识的隔阂内在于他们所处的双重自我中。就如同在传统的历史传记中，有着历史可信的文本和个体的重构，然而正是对那种隔阂的探索，不断改变的自我概念，写作、历史和主体性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范畴，影响了读者的理解。这些作品审视了现代主体的地位、结构、概念，以及存在形式。他们不仅探索了个体的自我，而且揭示了如何历史地定义作为哲学范畴的人类/人，思考了“谁”和“怎样”的自传性话语。这些文本虽然已有一些有价值的评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还是不为普通大众所知的文学现象，书写另一个人的自传能够成为一种很有力的文学样式和思想工具，从而反映人类的文化、历史和哲学的建构，也反映了个人身份，

以及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所体现的身份的再现和建构，反映了从社会和法律上定义自传主体的各种关系的影响力，反映了声音背后的伦理以及文学实践的道德蕴涵，因此，也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功用。

露西娅还对历史人物为主体的他传批评史进行了回顾。娜奥米·雅各布斯考察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的出现；劳拉·萨武也思考了作者身份、死后出版以及重写之间的交叉问题；伊娜·夏伯特把作者和人物之间的充满同情的身份认同看作小说/传记事业的成功标准，并含蓄地拒绝了后现代主义对技巧性、主体的碎裂和不稳定、以及恢复历史存在的不可能性的强调；利·吉尔摩探讨了历史性和虚构性之间的“界限案例”，她聚焦于创伤受害者在自传/传记中的再现，以及他们如何获得一系列生命书写的策略，如自传、传记、杂志、访谈等，以及虚构化手法，审视了自传传统的界限。米里亚姆·福克斯也将自传与创伤结合，将自传的介入看做是灾难的出现所引起的，福克斯所关心的是自传性叙事所响应的写作主体找到自身的创伤情境。露西娅认为，小说和自传/传记的关系，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文类演变，都集中在传记和自传文类内在的形式的、理论的和思想的诸多问题。她从本体论范畴的模糊争论转向更广阔的视野，不仅在地域上选择了不同国家的用不同语言书写的作品，而且关注了这些作品中自传叙事所揭示的哲学、法律和伦理的问题。

三

在《他人的自传》里，露西娅以上述六个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他传中的历史主体所面临的流放、暴力、法律、伦理等重要问题。她在第一章中对戴维·马洛夫的《一种想象的生活》进行详细的探讨，这本诗意的小说记载了奥维德在黑海流放的最后几年时光，以及奥维德的大都市观念同帝国边缘的野蛮生活之间的分歧，他逐渐接受了这种生活的真实和自然。露西娅分析了这位罗马诗人被贬的人生、最终的死亡如何被再创造，也将马洛夫的作品列入奥维德几个世纪以来的被神秘化的漫长历史中，再现了奥维德在帝国边缘的流放，代表着这部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现代后殖民边缘主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的运用、第一人称的使用、作品的结构安排指向的不仅仅是对个体的探究，而是对人类的探讨，以及我们如何给人类定义、划界，如何历史地处理人类的问题。正是因为难以确切地定位，她称之为人类的乌托邦。

露西娅在第二章专门研究了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的真实历史》中主人公的内德·凯利。臭名昭著的澳大利亚歹徒内德·凯利写了两封信，他讲述了自己的贫困和受到警察迫害的历史。其中一封信是他写给尚未出生的女儿，她可能直接从她父亲的声音中听到这个故事，知道她的出身。另一封信是写给立法会议员唐纳德·卡梅伦，他不像法律界和警察那样。一方面，内德

的作者身份将传递他的爱尔兰——澳大利亚家庭的文化、历史和个人记忆，以赋予他的女儿对她自身身份的认识；另一方面，法律界听到他的故事会让内德赋予自己被拒绝的法律主体身份。第一封信在道德上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真相；第二封信在法律上要求他合法地这样做。歹徒使别人遭受的暴力以及他们自己遭受的暴力引发了对身体作用、法则边界和各种感觉的议论，通过这种方式同世界建立了联系。凯里选择一个充满暴力的歹徒作为自传主体，其自传性写作呼唤着一种政治、法律和伦理的认可。

她在第三章研究翁达杰的长诗《比利小子》中的杀手，读者发现这个半文盲的男人被赋予了一种声音，他们的故事使生命叙事的所有权问题和自传/传记、暴力、伦理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展示。翁达杰的作品让人想起对身体遭受扒皮和解剖的描述，这种方式建立了一种受伤身体的美学，这也是对扒皮的文学和视觉再现的悠久历史的一部分，就像森林之神马亚西斯所遭受的那样。这都促进了进一步的讨论，即对他传如何同文学艺术史上的关于身体和主体性的各种形式的再现确立联系。美国身份、边疆生存、身体暴力，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翁达杰通过比利小子的他传对现代身份的本质和根源的探索。

对个体生活的历史状况的反映和对主体概念的理论探究所引起的矛盾对立，进一步引发了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解决难以逾越的，被后结构主义所假定的词语和指涉之间的理论僵局的可能和不可能。第二个问题讨论理论和历史、语言和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研究自传/传记同专制的、遭受战争破坏的20世纪欧洲史的联系，从而将争论建立在写作的具体历史状况下。她在第四章主要探讨吉尔伯特·阿戴尔的《作家之死》，它的主人公和叙事者斯法克斯披着德曼的薄面纱，卷入校园小说的犯罪惊悚片，他以巴特式的方式被谋杀了，依然以死去的作者第一人称在写作。同样的是，小说发挥了批评家的责任感的作用，不仅要求生活和写作的同形度，而且质疑对传记事实轻率的利用，回避缜密思想的需要，探讨自传与忏悔、伦理之间的关系。

露西娅在第五章讨论了他传与历史的交叉，这是20世纪欧洲被战争和专制制度所严重破坏的历史，以及暴政下的同步的必然性和调和与对话的不可能性。安娜·班蒂的《阿特米西亚》1947年首次出版，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阿特米西亚的生活。曼努埃尔·蒙塔尔班的《弗朗哥的自传》在他们的传记作家/叙事者和他们的他传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导向了对传记作家和自传主体之间关系的考察以及他人人生伦理问题的再现。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以第一人称说话和写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成为了关注的中心，作家的责任问题被重新审视。根据对知识分子的伦理、社会和政治作用的争论，要求作家以毫不含糊的话语来明确立场，扫除压迫和鼓吹的晦涩，治愈病态的语言。

从根本上说,自传处理的就是一对矛盾对立: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你自己”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那喀索斯的诅咒禁止对自己的了解。因为那喀索斯,苏格拉底式的要求无法完全实现;因为苏格拉底,那喀索斯的要求无法完全实现。自传的意义不是由过去所决定,却是通过当下的叙事强加的结构所决定。“自传不时地深陷与人生轨迹相同而又不断地分叉,处在其中而又永远地偏离;自我与他者的不同,审视的同步性和重新赋予意义的暂时性。自传始终摇摆在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虚构性之间,也处在神话性和哲理性之间”(Boldrini 23)。露西娅选择的这些他传文本,既突出了自传的真实性,也反映了自传两难的解决办法,这不是通过说出“我了解自己”和“我是那个人”的愿望,而是需要具备说出和证明“我是那种人”的能力。自传始终追求解决这种两难的办法,他传将其假设为传主身份探究的基础。自我和他者、主体和客体的隔阂,源于对传记/自传主体的反思,也内在于任何的叙事行为。他传的“双重自我”的叙事,恰如其分地和解了上述的冲突和分歧,也将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虚构性融合在一起。他传的历史主体,再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道德、伦理和法律。

Works Cited

- Boldrini, Lucia. *Autobiographies of Others: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Fiction*.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17.
- Edel, Leon. *Writing Lives: Principia Biograph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7.
- Folkenflik, Robert. "Introduction."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Construction of Self-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3.